

包括无数种族，例如美国含有白种及黑种。而白种复析为地中海族诺迪克族，及阿尔卑族；瑞士含有地、诺、阿等族；中国含有汉蒙藏等族。以国家与民族较：一国家可以包含无数民族，例如，美国含有条顿、斯拉夫、拉丁、犹太等民族；英国含有犹太、印度等民族，中国含有中华、蒙、藏等民族。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例如，盎格鲁撒逊民族造成英美等国；斯拉夫民族造成俄巨（Jugo-slavia）等国；拉丁民族造成法意等国。<sup>1</sup>

这样繁杂的论述，已经无法让人辨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至少是在借用西方概念的同时，又在试图去关照中国的历史长河时所发生的一种认知上的混淆。这是强调“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一种认知上的困境，面对西方既有的概念，无法从一种本土的概念中直接脱离西方的概念而形成自身的分析性的概念，包括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概念，都在试图通过某种巧妙的论证去弥合西方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困难。但是，由于钱穆自己对中史材料的熟悉，使他在晚年的时候已经能够从既有的这些国史材料中领悟出更加适合于中国历史解释框架的结构关系，那就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和作为部分的民族之间相互性的依赖关系。

后来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也是在此意义上展开，而没有再次像他的老师辈学者一样陷入民族概念的适用性与否的问题争执上去。甚至在这一点上，顾颉刚也是不能够被肯定的，因为他可能仅仅是注意到了作为民族国家统一性的这一面，而没有真正注意到“一体”之中所必然隐含着的多元分化的常态性。因此，就文化意义而言，观念和认知上的一体并不意味着没有各自文化接受和塑造上的分化；反过来也是一样，有着各自文化分化自我认知的群体，却不一定能够有着一种整体上的世界观念和认知，这种辩证，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民族问题讨论和认知的出发点。

## 【论 文】

### 从“同源纯汉”到“歌舞部族”： 抗战前后广西的民族形象建构<sup>2</sup>

马 楠<sup>3</sup>

**摘要：**1930年代，随着广西周边的国家不断对广西境内领土和民族宣称主权，如何对境内苗瑶僮等族进行表述以“正名”，成了广西当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种类不一”到“同种同源”再到“纯汉”，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刘介和其他广西学人不同表述的背后都受到抗战前后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随着抗战中后期文艺界团体南下桂林，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师生歌舞表演，又使得西南民族的歌谣舞蹈成为知识界眼中抗战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此后唱歌跳舞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深入人心。但就苗瑶僮等族而论，接受当局的形象建构并展示民族歌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接受政府的“开化”政策，广西整合民族的进程依然充满挑战。

**关键词：**苗瑶僮，刘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表述，歌谣舞蹈

<sup>1</sup>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潘蛟主编《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上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sup>2</sup>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1-102页。

<sup>3</sup>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学界关于广西边疆与民族的近期研究不少，或集矢于明清时期的广西土司的身份认同、土汉社会互动、民间信仰等方面，或聚焦于 1949 年建国后广西地区苗瑶壮侗彝等民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建构等问题，前者以杜树海《宋末至民初广西左江上游土酋势力的动向》<sup>1</sup>为代表，该文着重探讨了明清之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如何通过撰写家族谱系中的祖先叙事从身份上拉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距离；后者以卢露的《从僮人到壮族——20 世纪以来对广西壮族论述的变迁》<sup>2</sup>为代表，<sup>3</sup>该文梳理了 20 世纪以来对中国学界对壮族这一族群论述的变迁，第一部分亦提到了民国时期刘介、徐松石的著作对于僮人的论述，但因该文的重心在于 1949 年后对于壮族的民族识别，故而对于上述两位作者和他们的文本缺乏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对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时局和广西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亦缺乏必要的解读。研究夹处于明清和共和国之间的民国时期，尤其是新桂系和广西学人抗战前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治理，对于如何认识近代国人的西南民族形象和西南民族文化与国族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希冀通过分析抗战前后刘介等广西政学界人士的民族表述和特种师资训练所的民族歌舞展示对此给予一定程度的回应。

### 抗战前夕广西的民族局势与民族政策

1933 年 2 月 20 日（农历正月二十六），广西中心城市桂林附近的灌阳、全县、兴安、龙胜四同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瑶民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有数万众之多，并很快从桂北席卷到桂东北，一时间，瑶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彼时，广西当局正集中兵力肃清桂西北的红军主力第七军，瑶民的突然叛乱，给了新桂系一个措手不及。<sup>4</sup> 虽然新桂系很快完成军事部署，并调遣军队平定了叛乱。<sup>5</sup> 但此次事件对广西政学界震动不小，叛乱平定之后，桂林《教育周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谈谈苗瑶教育”的文章，时任广西教育厅科长的梁上燕，在文中回顾了历史上的苗瑶之乱，认为苗瑶二族“诚不可欺”，政府光是采用“痛剿”手段，并不能解决广西境内的汉人与其他族群的矛盾。作者最后感叹：“政府对于苗（瑶）人，在往时采用放任主义，把他们看作一种化外顽民，这种政策实在是极错误的。”<sup>6</sup>

广西的政局从 1929 年到 1936 年两广事变，一直未曾稳定。对于境内的苗瑶僮侗等少数民族，新桂系亦无暇顾及。而对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而言，活跃在四川<sup>7</sup>、贵州、云南、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更是尚未进入到他们的实际视野之中。<sup>8</sup> 相较于蒙古、西藏和回部，广西境内的民族人数既少，文化又低，既不危害国家，亦不能与国家有补。<sup>9</sup> 唯有被当做“化外的顽民”，随

<sup>1</sup> 杜树海：《宋末至民初广西左江上游土酋势力的动向——从〈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看祖先叙事的创制》，《民族研究》，2013 年第 4 期；或可见杜树海：《中国南疆的区域历史与族群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

<sup>2</sup> 卢露：《从僮人到壮族——20 世纪以来对广西壮族论述的变迁》，《西北民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或可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sup>3</sup> 关于 50 年代壮族的民族识别，亦可见于 Stevan Harrell,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sup>4</sup> 《南宁民国日报》1933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sup>5</sup> 1933 年 3 月 1 日，广西当局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十九师五十七团陈恩元部就在灌阳桐木江对起义瑶民发动总攻，不到半日，起义军就溃败；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虞世熙率领桂林区民团常备队，从 3 月 4 日向起义瑶民发动总攻，19 日，战斗基本结束。其它各县成建制的瑶民起义军也在数日内被新桂系军队、民团打散。见：谢祖莘：《绥靖兴安灌龙瑶变始末》，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秘书处，1946 年。

<sup>6</sup> 梁上燕：《谈谈苗瑶教育（未完）》，《教育周报（桂林）》1933 年第 49 期，第 7 页。

<sup>7</sup> 西康设置于 1939 年抗战相持阶段。

<sup>8</sup>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处于西川（后属于西康省）宁属彝区因关涉蒋介石“西南中央化”战略，逐渐受到中央军政势力的注意。但国民党中央对彝人的实际状况并不关心。赵峥：《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88 页。

<sup>9</sup> 林家琦：《苗瑶师资训练所参观记》，《血路》1939 年第 45 期，第 718-719 页。



他们自处。时论即指出，“自国民政府有边疆政策以来，勿用讳言的，其注视的重心，是在西北而非西南”，而此种重心的改变，一直要等到抗战以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边疆及西南边民的实况，始渐为执政诸公所明瞭。”<sup>1</sup> 但 30 年代，即便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政策，仍大多停留于纸面无法付诸实行。<sup>2</sup>

相较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蒙藏回部政策无法发生实际效应，以及对于西南苗瑶僮彝侗等民族的忽视，广西当局很快意识到处理境内苗瑶问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平定瑶民起义的同年，广西省政府即公布《广西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十一条》<sup>3</sup>，决定通过实施苗瑶教育，来达到同化苗瑶二族，继而解决民族问题的目的。广西省教育厅作为该方案的实施主体，筹划组织苗瑶教育委员会，以从事调查解决关于苗瑶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校舍、设备、师资、课程及教材等问题，并责成教育厅与辖有或毗邻苗瑶聚地之各县县政府一道，规划举办苗瑶学校，酌设苗瑶教育师范班，以希图养成苗瑶教育的师资<sup>4</sup>。1934 年 3 月 9 日，广西省苗瑶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sup>5</sup>，数月以后，苗瑶教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又以师资是解决民族教育的先决，遂成立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以招收苗瑶学生，期望苗瑶学生毕业之后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为政府代理人，回到苗瑶聚居地实行新桂系的同化政策。

特种教育，非广西新桂系当局首创，乃是南京方面围剿红军的制度创设<sup>6</sup>，而随着红军主力开始越出苏区进行长征，南京方面的势力亦尾随红军进入到西南。为避免中央势力以“剿共”的名义进入广西，广西方面先下手为强，不久就将“苗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特种教育委员会”，“苗瑶教育师资训练所”更名为“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虽不在五省之内，亦沿袭南京中央，以期在南京方面干涉之前主导本省的特种教育。与南京当局旨在应付苏区的赤化教育不同，广西当局的特种教育更近于边疆教育。

随着中日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不仅南京国民政府需要面对“国难”的到来，远处西南的广西，也需面对来自中南半岛暹罗和越南的挑战。广西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摩擦由来已久，但从 20 年代开始，《申报》及云南、广西当地的报纸就不断报道在暹罗发生的排华事件。<sup>7</sup> 作为 20 世纪初东亚独立三国之一的暹罗，原是一个总人口不过一千多万但有两三百万华侨、而皇室祖先又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一战后，“民族自决”论成为国际上处理民族关系的流行标准，泰人的民族主义亦随之高涨，如何造就一个只有泰人的民族国家，成为此后暹罗国内政治的主题。而在泰人的认知当中，泰族与中国云南、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本系出同源，在体质、语言、习俗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面对日益复杂的邻国形势，广西当局不能再将苗瑶等族群视作“蛮族”，

<sup>1</sup> 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边政公论》1948 年第 7 卷第 1 期，第 1、3 页。

<sup>2</sup> 1927 年的清共，使得国民党与苏俄的貌合神离也难以继。随之的结果是，受苏俄支配的外蒙古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而国民党所能做的只剩下对于外蒙发表口头上的主权宣言。此外新疆，1928 年接替刚遇刺不久的杨增新上台的金树仁，虽通电拥护中央，但私下却与胡汉民等国民党内的反蒋要角联系，欲图仿效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极力排斥国民党中央派遣青年政工干部进入新疆成立党部。继续维持民国以来新疆对于中央的独立地位。见 Xiaoyuan Liu,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9; 郭寄峤：《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8 页；吴志强主编：《国民党新疆党部档案史料》，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年，第 17 页。

<sup>3</sup> 广西省政府编：《广西苗瑶教育实施方案》，南宁：《广西公报》1933 年第 64 期。

<sup>4</sup> 《广西省施政纪录 民国二十二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594 页。

<sup>5</sup> 《教育消息：苗瑶教育委员会筹备进行调查工作》，《教育周报（桂林）》1934 年第 3 卷第 2 期，第 20 页。

<sup>6</sup> 游海华、饶泰勇：《从特种教育到保学：苏区革命后国民政府在江西的政治教化》，《苏区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88 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教育部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124-1125 页。

<sup>7</sup> 诸如《旅暹华代表呈北京政府文》，《申报》1919 年 4 月 16 日第 7 版；《暹罗华侨请派驻使》，《申报》1922 年 3 月 9 日第 10 版；《暹罗驱逐大批反日华侨》，《申报》，第 9 版，1928 年 12 月 8 日；《南洋华工危机日逼》，《申报》1930 年 9 月 14 日第 10 版；《暹罗袒日抑华国货会电请力争》，《申报》1933 年 3 月 2 日第 12 版。





把他们当作无足轻重的“化外顽民”来对待。

教育厅科长梁上燕提醒中国军政当局：“蛮，虽然是与汉人有界限的分别，但是我们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说，是可以承认他们是中国人的。但是过去的蛮族人，是被作为化外的顽民，是被我们所谓华夏后裔所轻视！其实，一个民族尽管包含着许多种族。我们对于苗、瑶，僮、猺是不宜看作化外顽民，无足轻重的！”<sup>1</sup> 梁的上峰，整个布局的主持者之一，身兼广西教育厅厅长、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和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雷沛鸿，则直接道出广西当局民族整合以应对边疆危机的策略。针对知识界自晚清以来始终纠缠于“民族”和“种族”的两个概念所制造的漩涡——以种族立国，则如何面对中国疆域的分崩离析；以民族立国，则又如何自证且能说服世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美国负笈多年的雷氏，<sup>2</sup> 以政治民族美利坚民族作比，声言道：“吾国在过去数千年间，关于团体的组织及生活，概偏重于家族宗族及种族，所以民众的组织尚未完成，民族的生长尚未成熟，从今而后，我们必须设法联合所有国内不同血统的种族，而求其一律民族化。恰如北美合众国，在其中实含着无数种族，然而，美国人概以盎格鲁撒逊族为主体，依之，即以同化国中所有不同血统的民众，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久以闻名为一‘大熔炉’。”雷氏批评时贤：“多不明世理，好混同种族与民族，从前尝有‘五族共和’之说，宛若中华民国当真以满蒙回藏五个民族构成，果尔此等见解，衡之于现代政治学说，可谓荒谬绝伦。一个民族尽可以包含许多种族，但这些种族必须于或迟或早间相与同化，而成为一个民族，然后这个民族才能够继续生存于大地”。<sup>3</sup>

雷沛鸿以“政治民族”的表述来反对一些“时贤”的“血缘民族”表述并不稀奇，但雷氏设想中的民族，却与彼时中国社会最流行也最急迫的“组织”一说结合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组织不同，在雷氏的表达中，民族本身即是一种组织动员民众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同化境内不同种族以造一个民族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为一个整体的过程<sup>4</sup>。他认为，现代社会中以民族生活为最有组织，而此种民族生活即是“四万万只头，四万万张嘴，四万万只鼻，八万万只眼，八万万只耳，八万万只手，八万万只脚，合铸成一颗中国心”。<sup>5</sup> 正基于此，表面上只是针对苗瑶少数民族的特种教育，却是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广西建设布局当中的一环，苗瑶的特种教育与汉人的国民基础教育，其实是一体两面，看似民族政策的表面，所欲达到的目的是组织民众<sup>6</sup>，完成“国难”到来之前的社会整合。这正映照了新桂系三四十年代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sup>7</sup>。

但上述布局急需熟悉苗瑶社会情况的人才加以落实，并且将以上的民族政策进行更为合理化的表述以防境外国家的攻讦。正如前文梁上燕的文章所指出的，政府对于“广西境内蛮族的实际人口数目，生活状况，容貌体态服饰，有无文字，居处怎样，均付之阙如”，而苗民“国语不通，文字未有”，又如何将他们与汉族一起组织成为“政治性民族”？因此，寻找对苗瑶社会生活相当了解的本土人士，使得上述思想能够切实施行，成为广西当局的当务之急。

<sup>1</sup> 梁上燕：《谈谈苗瑶教育（未完）》，《教育周报（桂林），1933年第49期，第7页。

<sup>2</sup> 雷坚：《雷沛鸿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18页。

<sup>3</sup> 梁上燕：《谈谈苗瑶教育（未完）》，《教育周报（桂林），1933年第49期，第8页。

<sup>4</sup> 其实早在1923年，国民党宣言中，即有表示：中国国民党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之后的国民党“三大”也有“于民族主义上，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表述，但都无法付诸实践，且很少将对社会的“一盘散沙”与“无组织”的批评和中华民族的尚未建成这一构想联系在一起。《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第487页。

<sup>5</sup> 《论雷沛鸿的伟大人格》，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页。

<sup>6</sup> 1935年，时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受到广西当局实际政务主持者黄旭初的邀请，前往广西参观广西的新建设，感叹于广西当局将民团与基础教育结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亦通过民团与教育的方式，开化当地的族群。对于广西的社会组织力大感钦佩，当时陪同胡政之参观的，正是雷沛鸿。胡政之：《粤桂写影》，收入于《广西印象记》，广西省政府，1935年。

<sup>7</sup> 《广西建设纲领（1934年）》，《桂政纪实》，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0年，第255页。



## 广西学人书写广西民族：《苗荒小纪》和《岭表纪蛮》中的“蛮族”形象

刘介<sup>1</sup>，字锡蕃，1895年出生于距离桂林不远的广西百寿县。1908年，他考入彼时广西省最高学府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历任广西柳州八县合立中学教员、广西庆远六县合立中学校长、梧州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有丰富的中等学校教学经验后，于1924年成为“苗瑶居十之九”的桂北三江县长，虽因“时局变幻”而“视县未久”，但刘在担任县长期间，对三江及三江周边的苗民聚族腹地，有了深入的考查，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早在民国元年，短暂担任广西罗城<sup>2</sup>县长苏次河幕宾的刘介，就已经有过一段为期一月的考查苗山侗岭的调查，在调查归来后，刘即将所发现的苗瑶侗等族一手资料，发表于广西省《教育报》上。1925年，刘介将他弱冠时的苗山游历与担任三江县长期间所积累的田野考查资料整理成《苗荒小纪》一书，于192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描写苗人生活最为详细的专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介进入到特种教育委员会，并担任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成为表述广西境内民族的重要人物。

在《苗荒小纪》之前，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辛树帜、石声汉就已深入广西大瑶山<sup>3</sup>进行田野调查，并撰成《瑶山调查》，之后任国荣撰写了《瑶山纪游》、《瑶山两月观察记》，陈锡襄作成了《瑶民访问记》。<sup>4</sup>上述这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报告，对大瑶山进行了描述。但作为家乡距离苗山和瑶山均不远的本省人，因其长期深入苗瑶生活社群中的经历，刘介的《苗荒小纪》相较上述调查报告，有着更多的深描和政治意涵，也因此更加符合广西当局民族整合的旨趣。

在《苗荒小纪》中，作者一改往昔汉人观察者对于“蛮族”的轻视和民族学者文字背后的冷漠，将苗民（同时也是瑶民）刻画成为具备：服从命令勇闯敢死不怕牺牲；勤劳俭朴尚；凡事以会议决之，团结服从公意；家庭和睦，婚配自由；克己守法，盗匪绝迹；体质精悍，言行忠实六大优点的民族。虽然作者在其后亦列举了苗瑶民的一些缺点，并认为苗汉“种类不一”，但刘笔下的苗瑶民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与此前“化外顽民”完全不同的现代公民形象。

书中前十九章的分类，尤以婚丧、刑罚、体质、诉讼、契券、集会六章呈现上述的形象。如“婚丧”一章，作者谈及苗人的婚姻，有婚礼过后，女方归宁二三年的习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苗人以为，“青春时期须及时行乐，未可操心家政而为夫权限制也。苗人称此时期为‘做后生’。期满或已生子女，则尽携所有以至夫家，夫妇唱随，循规蹈矩，无复从前自由矣”。<sup>5</sup>关于苗俗“做后生”，日后的人类学者自有不同的解读<sup>6</sup>，苗俗与汉人礼法不同，能够允许妇女在婚后依然保持二三年的自由。但在“五四”时潮下刘介却将“做后生”表达成是苗族妇女对于“夫权”的反抗，由此表明在婚恋方面，身处荒山之中的苗人社会比受礼法规制的汉人社会更加的进步。

而在婚礼仪式方面，“婚期次日，婿家必选善歌者，送新妇归宁。如家设席款宾，论，则以天秤置于案上，而歌大作。歌词大概谓天秤在此，婿家须纳买骨金，言妇已卖于婿也，于是婿家

<sup>1</sup> 刘介（1885-1968），广西百寿（今永福县）人，1949年建国后，曾历任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校长、广西文史馆副馆长、自治区政协常委，著有《苗荒小纪》、《岭表纪蛮》。

<sup>2</sup> 距离三江县西南不远处，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sup>3</sup> 即今天位于桂东北的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

<sup>4</sup> 辛树帜、石声汉：《瑶山调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42期；任国荣：《瑶山纪游》，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5-36期；任国荣：《瑶山两月观察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46-47期；陈锡襄：《瑶民访问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5-36期。

<sup>5</sup> 刘介：《苗荒小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页。

<sup>6</sup> 李亦园：《汉化、土著化或社会演化——从婚姻、居住与妇女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年。



援引故事，亦唱歌以却之，……久而两不能屈，始言归于好，婿家纳银于秤，初少许，且唱且益，至秤平，婿家突出巨重黄金白物，倾满盘，盘重不能兴，妇家始言礼太厚，唱歌谦谢，取其九钱六或一两二钱，余悉还之，此即所谓聘金也”。<sup>1</sup> 该书对苗人极富表演性的置秤收受聘金的仪式详加描述，秤平即为平等，婿妇双方以唱歌的形式来回拉锯，实则如同双方说理互辩，将日后不必要的纷争以戏谑的方式在婚礼上呈现出来，聘金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则是平等拉锯的过程，借用此一仪式既展现了苗民的平等意识，同时还展现了歌谣在苗瑶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交涉作用。

在“刑罚”、“诉讼”、“集会”三章中，苗民又被描写成逢有要事或刑讼，每一公意决之，一旦通过，家家遵守，砍木刻为志，“苗民有事，一以公意决之。故事必会议，议必实行。……召集之法，由众所选举的苗头砍木刻，使人传示区内各寨，寨民无论男女老幼咸集鼓楼”。<sup>2</sup> 刘氏感叹：“不图此蛮烟瘴雨之地，尚复有所谓公理与民意也”。如此崇尚自由平等，尊重公理民意并且男女平等的苗瑶民族，虽不比汉人知书明礼，却更加具备与现代文明接榫的素质，在作者看来，只要克服彼族不讲卫生、不习汉语、国家观念淡薄、迷信神力等缺点，再加上其本身精悍勇猛的体质，就一定能将他们塑造成优秀的国民。

《苗荒小纪》一书虽似经验民族志，对苗民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但刘介的分章和结论无疑带有其自身的价值偏好，但他对于苗瑶“服从公意”、“勇闯敢死”的论断，却给了广西当局实施教化苗瑶很好的理由。更何况随着“国难”日亟，培养善战好勇族群的国族意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干城，不论对于广西还是中央而言均属双赢。

1932年暹罗政变，对中国颇有私交的泰王拉玛七世随即退位，服膺日本法西斯的内阁少壮派充分掌握暹罗的政权。<sup>3</sup> 同年，美国传教士杜德《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文译成泰文在暹罗广为流行，“南诏泰族王国说”随即进入到泰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成为构建泰族的历史记忆。按照泰族的声称，遵照民族自决的办法，中国云南和广西部分的领土应该独立出去。此后受日本支持的暹罗政府，开始大力宣扬“大泰唯国主义”，并更改国号为泰国，以便去统一处于中国云南、广西境内的一切泰人。<sup>4</sup> 在法西斯势力日益主导东亚的时局下，“政治民族”主张不断式微，“血缘民族”呼声日渐高涨。如何将“种类不一”并且历史上不断发生过抗争和冲突的族群表述为一体，实现同化，成了广西学人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4年，已成为特种教育委员会特聘委员刘介，为解决上述问题，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岭表纪蛮》，正如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斯篇以为治理（民族）之南针也”。<sup>5</sup> 该书虽在原有的《苗荒小纪》的基础上写成，却集中反映了广西当局危机形势下的民族观。相较于《苗荒小纪》，在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岭表纪蛮》中，作者不仅搜罗考订了涉及到广西所有民族的古史、方志和传说以充实之前较为单薄的《苗荒小纪》，更在书写中安装了三种意识形态装置：瑶苗僮汉人种西来说，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和汉蛮同种，以最终表达汉蛮本为一体，在起源上乃是同一种族的观点，只是因为“吾国汉人对于蛮族一般之概念，辄不究其历史、地理、政治上之原因，才见其与己不同”。并且汉人对蛮族“轻鄙”、“猜忌”、“仇杀”，才造成了汉蛮虽有数千年的关系，却迟迟没有同化蛮族的当下处境。<sup>1</sup>

此前不久爆发的瑶民起义，使得该书更加凸显了瑶人的主体地位，但作者所在意不止于此，开篇伊始刘介就花了大篇幅，利用正史、杂史、类书、笔记和志怪小说，以及涉及蛮族描写的各县县志，对瑶、苗、僮、侗、狼、獯、獠、獯、獯等各族的历史源流和“南移大势”做了详细的叙述。

<sup>1</sup> 刘介：《苗荒小纪》，第10-11页。

<sup>2</sup> 刘介：《苗荒小纪》，第24-25页。

<sup>3</sup>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35-258.

<sup>4</sup> 素察·奔波里叻：《南诏——是我们泰族的疆域吗》，叶国忠译，《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4期，第71页。

<sup>5</sup> 刘介：《岭表纪蛮》，黄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由此建构了一个上古汉瑶苗僮相处、交流、移动的动态图景。

作者认为，瑶族相较各族是桂省最古的民族，其散播地点遍于全境，根据瑶民的“盘古传说”和“先有瑶后有朝”的谚语，刘认定瑶族即为最先据有中华之国土的居民，在先有了这个结论之后，他再排比史料，认为“盘古为首出御世之君”，即首先开辟中国的族群首领，盘古的子孙——瑶族“袭盘古之业，据有中华沃壤，久而安逸脆弱，而苗族适以游牧刚武之民族踵而后至”，<sup>2</sup>瑶族遂“败退南土”，而苗族“又蹈瑶族之覆辙，复为汉族所败，由是苗窜而南，瑶族益窜而南，遂造成今日地盘之形式”。瑶族“自中原南窜，尧唐时由湖北历洞庭，水陆形势以湘粤闽赣为便，故广东及湘桂之南俱无苗，而瑶族则意味渊藪”。<sup>3</sup>而苗族，作为“诸蛮中之优秀份子”，在经历历史上数次苗汉战争后，“此族不断败退，因有瑶民阻于其前，故由湘西折入黔滇，不敢向粤逃窜，是以桂北、滇东、蜀西及贵州全省之区域，满布其族之势力”。而广西境内人数最多、汉化最深的僮族，刘介认为其迁来最迟，原居蜀地，后因汉人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付苗民和瑶民，僮人随汉军南征，遂广布整个桂省。<sup>4</sup>狼、獯、獠、狢实属僮族的分支。侗族，则“杂居于苗族之内，是为原始的‘老汉人’，其移殖中华，较汉人之本族为早”。<sup>5</sup>在叙述完各族的历史迁移与地理分布之后，如何将《苗荒小纪》中的苗瑶与汉“种类不一”自然转化为苗瑶汉“同种”，刘介引入了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流行的观点“中国人种西来说”来加以论证<sup>6</sup>。

“中国人种西来说”最早由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起初，拉克伯里的观点是汉人的祖先黄帝裔出巴比伦，所以汉人的祖先是巴比伦人。随后该观点“旅行”到日本，遂有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最终通过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转述，“西来说”传入中国。<sup>7</sup>一个观点经过数次的“旅行”最后抵达中国时，便衍射了多个版本：有巴比伦移住，有印度移住，有埃及移住，还有塔里木河移住。在《岭表纪蛮》中，刘介根据30年代欧洲探险家的流行观点，相信汉族和苗瑶僮侗等西南民族的祖源地都在中亚塔里木河。<sup>8</sup>在史前时代，汉苗瑶等族尚未分化，皆以部落杂处，此时汉与苗瑶不论习俗还是体质完全相同。后来瑶苗汉分批迁移到中华，遂造成今天的地理分布格局。由此作者认为，苗瑶与汉同源同种早自东移入中华时就已决定，自迁移到中华后，苗瑶与汉人一样都是中华固有之民，而中南半岛之暹罗、安南均是民族再次迁移的结果。在“民族自决”论和“种族”论盛行的30年代，“民族”不仅是国家构成的主体，“民族”也是国家领土的唯一合法拥有者。正如苗瑶教育委员会委员唐兆民在《岭》书序言中所强调，若非细考本民族之渊源所自，任由欧美日本学人解释，那么苗瑶僮则很可能不再属于中国人，而苗瑶僮人所生存的土地，自然也不再属于中国固有之领土。正是有此危机意识，刘介必须通过上述叙事为广西当局化解民族同化棘手的“汉蛮不同种”问题。并对暹罗、安南等邻国的各自学说予以回击。

而要达成广西当局对于蛮族的第二步“同化”要求，刘介必须大幅度扭转《苗荒小纪》中对

<sup>1</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34页。

<sup>2</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47页。

<sup>3</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48页。

<sup>4</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47页。

<sup>5</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62页。

<sup>6</sup> 有意思的是，2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潮流就是批判十九世界末由日本传来的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傅斯年、李济、何炳松等人，始终试图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和多元性质。但不论是主流学术界的傅斯年、李济等人，还是广西教育界的刘介，两者虽然对“中国人种西来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又或者是主流学术界的讨论尚未传播到西南边境），但两者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致的，即是培植中国的国族意识。可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于傅斯年著，何兹全整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何炳松：《何炳松世界简史（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

<sup>7</sup>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6-137页。

<sup>8</sup> 刘介：《岭表纪蛮》，第62页。



苗民崇尚自由平等，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评价。将苗瑶社会表述为需要汉人教化的低阶社会。此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原始社会”概念成了合适的工具。1933年，另一位对苗瑶社会有着切实考察的桂省教育厅科长唐兆民<sup>1</sup>，在给《岭表纪蛮》的序言中慰勉这位“同砚中最挚之良友”，愿他“以摩尔根自任”<sup>2</sup>。由杨东莼翻译的《古代社会》于1930年在上海昆仑书店付梓，1932年杨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往桂出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并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带到桂林，<sup>3</sup>可以推断其翻译的《古代社会》必对唐兆民、刘介重新认识苗瑶社会产生影响。在《苗》书中，刘称许苗人社会具有公意和民意，但在《岭》书中，刘则运用了摩尔根的核心概念“原始社会民主制”将其描述为“不进化之民族终不脱古民之窠臼”；《苗》书中所表现的苗瑶社会妇女与男性地位平等甚而更高，在《岭》书中则被视为“母系社会”的残留。如此一来，苗人在集会、契券和婚丧等各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均被表述了原始社会的遗迹，而这些原始社会的遗迹汉人社会曾经也有，所不同的是，汉人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而苗瑶仍停留在原始社会中。在此，刘介视苗瑶社会为中国历史“线性进化”的初始阶段，就像摩尔根视印第安部落一样，认为“他们”只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将是“他们”未来。拯救他们的唯一方式，便是让他们摆脱落后的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之中。如果说“汉蛮同种”是为了破除“种族”障碍，那么运用摩尔根的概念工具，则赋予了广西当局同化苗瑶的正当性。

虽然作者在新书中对苗瑶社会中的娱乐、契约、歌唱、集会有了更加详实的描绘，并且在广西当局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之外，表达出对苗瑶民族文化的由衷喜爱。但该书的目的仍是为桂省的民族政策做张目。不久，刘介即担任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而《岭》书终篇所提出的“治蛮刍议”，与同年广西当局颁布的《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在内容上几乎完全相同。

### 抗战时期的民族表述、歌舞展示和瑶人因应

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国的重心逐渐向西南转移。数日之前，尚在国民党中央和知识界视野之外的西南边疆，因为战争的变数成为了抗战建国的大后方，1938年随着广州的沦陷，云贵川桂四省的命运关涉到抗战是否能够最终取得胜利。与此同时，日本政学界人士来到泰国宣传桂滇为泰族的故居，鼓动泰政府收复失地，<sup>4</sup>以期泰政府与日本军队一起南北夹击中国。这样的背景迫切需要国民政府和中国知识界推动国族建构，以培养西南民族的国家观念。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燕京大学，对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考察，随后执教于云南大学的顾，于1939年元旦，在自己所创办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文章，2月份又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sup>5</sup>20年代对“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观点发起冲击的古史辨派领袖，如今为了不再刺激国族分裂而选择为民族主义发声，标志着抗战时期知识界风向的转变。此后，中华民族起源多元但在历史中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自古同源论甚嚣尘上，成为国民政府动员民众的武器。进而有学人起而反对再使用“民族”一词以防民族问题授人以柄。<sup>6</sup>上述观点逐渐成为政学界认识民族和边疆的主流。随着知识界人士和国民政府一同南迁，西南民族就成为了这种观点的主要论述对象。

<sup>1</sup> 唐兆民，时任广西教育厅分管民族事务的科长，1935年曾陪同费孝通、王同惠前往大瑶山调查。著有《瑶山散记》。

<sup>2</sup> 刘介：《岭表纪蛮》，唐序。

<sup>3</sup> 杨慎之：《杨东莼传略》，选自杨东莼：《杨东莼文集》，中华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页。

<sup>4</sup> 1939年，銜披汶在“六·二四”广播中宣称“我泰语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余万人，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要收复失地。王连浩，陈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民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87页。

<sup>5</sup> 葛兆光：《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sup>6</sup> 黄举安：《中华民族是整体的》，《蒙藏月报》第13卷第6期，1941年。





1941年《边政公论》创刊，成为抗战中后期强调民族整合的重要刊物。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几乎均关涉西南民族问题。其中关于广西的研究亦不少，有丁骧的《西南民族考释》，郑鹤声的《清代对于西南宗族之抚绥》，曾昭璇的《粤北瑶山地理考察》，梁瓿第的《广西瑶民教育》、陈宗祥《猺罗的宗教》、徐益棠《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等等，这些文章均从“汉蛮同源”的论点出发，研究广西境内民族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法律。来自北平和东南的学人第一次来到从未踏足的广西，带着强烈的民族同化的目的进行调查取样，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此种研究取径正是抗战时期学术界的一大特色。但也因为这些南下学人的论述，国民政府和民众对西南民族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194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及中央研究院已经拟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规定西南少数民族的名称不再有虫兽鸟及反犬等字样，以示各族群一律平等。<sup>1</sup> 1942年，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各界人士的演讲时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庭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sup>2</sup> 而蒋的“宗族论”经过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整理最终以《中国之命运》的形式出版。标志着中国此时的政学界在国族建构方面达成了共识。对于广西省而言，1941年，教育部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前往滇黔桂考察，并发表《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意味着广西特种教育在抗战时得到中央的认可，而此前刘介的苗瑶僮汉“同源说”，更被教育考察团视为应当推行的“国策”。相较于滇黔二省对于边疆教育的不加重视，教育考察团认为广西的边疆教育虽然经费不多，却在“灌输国族意识”、“着重国语教学”和“注重生产技能训练”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并极力赞同刘介“倡历史、地理的因素为民族成因之说，并尽量宣扬苗瑶汉相互融洽之故事”以重新估定民族的做法。<sup>3</sup>

面对国民政府和南下学人对西南民族的逐渐重视和对本省民族政策的肯定，桂省学人的回应则是将苗瑶僮侗等族的地位更加抬高。大概出于广西军队在抗战中的良好表现，广西政学界一改战前少数民族虽“同源同种”但处于原始社会落后的形象，在“宗族论”（或“部族论”）的基础上，将苗瑶僮描绘为比汉族“更为纯正的汉人”。

1940年，刘介在广西当局抗战刊物《建设研究》上撰写《广西氏族研究述略》一文。该文表面上是对桂省大族巨姓的族源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自汉族秦汉之间移殖桂省后，尤特明清两代与桂省本地族群融合，使得苗瑶僮等族均袭用汉人姓氏，这些大姓巨族尤以黄、李为多，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实出力不少。<sup>4</sup>实际上因广西当政者李宗仁、黄旭初、李仁仁<sup>5</sup>等均属刘笔下的西南巨姓大族，此文其实是想证明，在抗战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桂系领袖和数十万广西军人，他们本身就是西南民族的后裔。

而对苗瑶僮比汉族“更为纯汉”的论述则来自于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在这本出版于1939年的书中，身为僮人的作者宣称：华夏族并非一定属于黄帝子孙，四千年前的黄帝部落不过是广义汉族当中的一支，形成中原文化的四巨头除了黄帝之外，尚有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而后三者正是僮人的祖先。此后，广义的汉族分化为三个集团：黄河集团、江汉集团和峡谷集团。黄河集团流传为齐鲁秦晋等文化中心，江汉集团泛滥为楚越吴等中心，峡谷集团一方

<sup>1</sup> 杨思机：《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76页。

<sup>2</sup> 蒋介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16页。

<sup>3</sup> 《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2），第151-170页。

<sup>4</sup> 刘介：《广西氏族研究述略》，《建设研究》，1940年第5期，第58-67页。

<sup>5</sup> 李任仁（1886-1968），广西临桂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1年任广西教育厅厅长，1933年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1936年赴沪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与沈钧儒、胡愈之一道在广西发起组织文化供应社。



面附属于江汉集团，一方面孕育为哀牢古滇越裳扶南等掸族泰族文化。作者根据僮语当中普遍存在的倒装辞现象，将僮人的族名与古地名结合研究，以同声借音的方式，得出僮人不仅是江汉集团的直系后人，还是峡谷集团文化的创建者这一结论。与刘介的认识不同，徐松石认为僮人才是桂省的土著，而其族遍及于中国西南和整个中南半岛。<sup>1</sup>作者在书中对“南诏泰族王国说”大加批驳，并将泰族、掸族视作僮人的后代。

面对晚清以来主流知识界将黄帝神话作为国族建构的核心，徐松石从文字、语言、体质、地理角度入手，跳脱黄帝一系并论证黄帝只是四千年前广义汉人集团中的一支，而僮人的祖先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才是四千年前汉人集团的主流，此后的汉族多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在语言和体质上都有不小的变化，而反观身材瘦小，操馱舌却单音语言的僮人却是最纯粹的汉人。由此一来，不仅僮人在中国文化版图中得到极高之地位，僮人在东南亚文化版图中亦得到至高之地位<sup>2</sup>。徐松石的该项研究自始至终受到广西当局的鼓励，早在1935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的徐松石就受到雷沛鸿的邀请，担任桂省国民基础教育暑期训练班主任，遂得职务之便在邕宁和左右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1938年，徐为撰写此书再入广西，得到黄旭初和时任教育厅厅长的邱昌渭种种便利，同时亦得到刘介和唐兆民等桂省教育界人士的相助，<sup>3</sup>徐“僮乃纯汉”的说法与其说是得到了广西当局的支持，毋宁说是广西政学界战时民族观的写照，书成之后，徐松石也以“民族学家”的身份得到特种教育师资研究所<sup>4</sup>的受访邀请。

但仅仅停留于“同源说”与“纯汉说”去认识西南民族，那么西南民族在知识界心中的形象则依旧模糊，但苗瑶僮歌谣舞蹈在抗战中后期有效地弥补了此种单一叙述，事实上，直观的形象展示比书写更能深入人心，而此后知识界对西南民族歌舞的关注甚至盖过了苗瑶僮汉是否同一民族的讨论。抗战以前的《岭表纪蛮》，刘介就单独辟出“歌谣”、“音乐”二章，对唱歌在苗瑶僮侗人人生观中的意义，苗瑶僮侗歌的声调，芦笙苗笛瑶鼓的演奏方式等做了详细描述，这种书写安排，与明清时期只能在方志、笔记“风俗”篇中见到苗瑶歌舞明显不同，苗瑶僮人好歌，但长久被汉人以“有伤风化”视之。五四后民俗学兴起，传统文献中的“风俗”在知识分子视野中有了微妙的差异，代表大众的“民俗”成了五四后知识分子创造“新文化”的一个取向。<sup>5</sup>刘介花费许多篇幅探讨苗瑶僮歌谣，还为此收录“蛮歌一百二十六首”，认为这些歌谣情致缠绵，词旨悱恻，将西南民族歌谣视作建立现代中国民俗学的重要材料。随着抗战爆发，知识界提倡“文艺大众化”，苗瑶僮歌因其“平民化”、“两性化”、“团体化”的合唱形式与抗战文艺策略相符，而日益获得知识界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从五四至抗战，以民间小调和戏曲为代表的国乐一直饱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被认为音律缺乏，尚未进阶到复调和和声的层次，比之于西洋音乐，实属原始阶段，文化界甚而存在着“中国是没有音乐的民族”这一悲观论调。<sup>6</sup>但在闭塞的苗瑶僮地区，苗瑶僮的歌谣表现形式却与苏联、欧美的合唱团、朗诵诗等表演形式相契，其本身丰富多样的音乐要素，也使得它具备了代表抗战“新中国音乐”的可能。

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成立伊始，刘介即在特师<sup>7</sup>内开办歌谣会，借助歌谣会的平台，着力吸

<sup>1</sup>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267页。

<sup>2</sup> 相较苗瑶等族，抗战时期时人普遍相信僮人与泰族系出同源。如果能够证明僮人纯粹的华族，那么泰国、日本等关于西南民族的说法将不攻自破。见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1945年。

<sup>3</sup>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序言，第2页。

<sup>4</sup> “宗族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更名为“特种部族教育师资训练所”。

<sup>5</sup>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4页。

<sup>6</sup> 王小昆：《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三辑，桂林：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年，第474页；此种论调，彼时亦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见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7</sup> 为简略起见，以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简称为“特师”。



纳西南各族歌谣舞蹈等音乐形式，并加以整理，但刘介并非把它们放置在苗瑶社会结构中来加以认知其功能，并体会其对于苗人瑶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而是将它们提取出来，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像文物一般陈列在特师中加以研究。刘介规定，特师定期停课半日让学生穿着学生制服，或吹芦笙苗笛，或拿瑶鼓，表演给到校的视学和校外的人士看。穿着中山式制服进行民族表演<sup>1</sup>，这样的文化展示，一方面，让观者无从区分非汉学生与汉人学生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当然是塑造中国“只有一个民族”的形象。但另一方面，特师竭力向汉族官员和民众展示苗瑶的歌舞，在表演与相互对视的过程中，苗瑶的民族认同却得以形成。在民族主义成为思想主流的时局下，特师学生的民族歌舞展示却使得西南民族文化在不断被强调的国族文化内拥有了自己的空间。同化“蛮族”的同时却又保留了“蛮族”，使得广西当局整合境内民族的过程内部多了一层弹性与张力。

这样的展示，战前尚且停留于广西一省，1938年后，因外省人士数十万避难桂林，使得已迁往桂林的特师有了更多展示民族文化的机会。抗战之初，特师就曾组织学生慰劳队，到永福、临桂等县慰劳从各县被征调去修筑湘桂铁路、黔桂铁路的苗瑶僮青年，给他们表演歌谣舞蹈。到了抗战中后期，南迁桂林的文化界人士众多，隶属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的文工队、抗战演剧队等纷纷暂避桂林，而这些文化团体迫切需要观摩学习苗瑶僮的歌谣舞蹈乐器等一切艺术形式。特师对于他们的要求一概答应，凡来参观团体，特师都有表演，同时还编订各种舞蹈剧目，出城为桂林市民表演。<sup>2</sup>1939年4月，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师生就与南下广西的抗敌演剧九队、新安旅行团多次举行“歌咏话剧联合公演”和“联合晚会”，并在演剧队西式歌剧风格的指导之下，编写了集中苗瑶僮民歌、舞蹈、芦笙和口技于一身的《可爱的新广西》、《抗日歌》、《孟获舞》、《蛮瑶铜鼓舞》等歌舞作品。并在桂林城上演，引起热评。当时迁桂的共产党报刊《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专刊特辟“从特种部族之舞到民族的新舞蹈”专栏，对西南民族的舞蹈在抗战文化的意义做出极高评价。<sup>3</sup>

1940年，应雷沛鸿和刘介的盛情邀请，因上海沦陷而走港来桂的陈志良<sup>4</sup>前往特师授课，授课之余，“爰作民族民俗学上之采访”，以编辑苗瑶僮侗彝等族歌谣，“半年之间，得歌二千五百首，胥自手抄录，详加校勘，逐条排比”，<sup>5</sup>并用国语翻译，遂成《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一书，这些歌谣大多即得之于特师学生。该书虽对西南民族歌谣进行国语翻译，从而未能保存歌谣本身的音韵和音调，并按照汉人的审美对歌谣进行了筛选取舍，但该书作为研究广西歌谣的首部著作，使得当时辗转来到桂林的中国文化人对于西南民族的歌谣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年，撤退到桂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共产党员林路和刘式昕在桂林新华大剧院指挥了三部音乐剧，由特师学生表演的广西苗瑶歌舞，作为广西音乐的代表，与《黄河大合唱》、《一九四一进行曲》一道出演，更是将苗瑶歌舞提高到了抗战音乐的地位。不久，已经成立歌舞团的特师在广西省府大礼堂又进行了专场表演，展现“土风歌舞”。在观瞻苗瑶僮等学生的歌舞表演后，南下的文化界人士大为感慨，“谁说中国没有音乐，请他多深入民间去听一下吧！虽然或不如交响乐的复杂和谐，但却表现着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建设新的音乐形式，如果只是把眼光放远向西洋音乐

<sup>1</sup> 康乐（摄）：《广西特种部族师资训练所举办瑶侗歌舞音乐会》（附照片）（中英文对照），《东方画刊》1941年第3期，第11-21页。

<sup>2</sup> 刘介：《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韦生理主编：《晚晴文存——广西文史研究馆员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第384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2年，第188-206页。

<sup>3</sup> 冯明洋主编：《浩歌》（全2册上），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50周年纪念丛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sup>4</sup> 陈志良（1908-1961），上海人，3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文科专修学校国学系，1936年担任上海浦东地方报《东报》主编，1937年淞沪抗战后，陈前往香港。

<sup>5</sup> 陈志良：《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说文月刊丛书，桂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2年，第5页。





的成就，而忽视了我国民间音乐的全部遗产，那是一种偏狭的见解。”<sup>1</sup>知识人因战乱南下，却在广西比自己更为“原始”的西南民族的合唱和舞蹈表演下，发现了能够与西洋一较高下的民族音乐形式，这对于抗战期间的民族自尊不啻为之一振。

1944年3月，在抗日文化界备受瞩目的“西南剧展”上，特师边疆歌舞团<sup>2</sup>在该校师生林启海、张企、蒙建青的率领下，为剧展大会演出了包括《瑶山情调》、《侗族游牧曲》、《板瑶腰鼓舞》、《苗岭民谣》等总称为《苗瑶侗民谣舞蹈》的民族歌舞十四种，时人将此评价为此次剧展最伟大之收获。<sup>3</sup>这些歌舞展示了西南民族的舞蹈、服饰、乐器，通过大型歌舞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面前，勾勒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民族风情画卷。为了达到逼真的舞台效果，特师师生深入瑶乡苗寨搜罗演出所需的全部服装、道具、乐器<sup>4</sup>，不再如抗战前“穿着学生制服进行表演”，而是竭力真实再现西南民族的风貌。这次演出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使得知识界此后不断派代表到桂观摩特师学生表演，将歌舞视作了解边地风光的窗口。在与南下文化群体的交流过程中，一方面南下文艺团体吸纳了西南民族的表现形式和音乐风格，并通过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师生歌舞表演，认识到了西南民族的存在和独特性。另一方面西南民族的歌谣也在文艺团体的对演和指导下，成为抗战国族文化建构中的一部分，并被南下知识人视作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竞逐的代表。因为抗战，使得苗瑶侗的民族文化的生存有了一定的空间，也因为抗战，知识界“发现”并“选择性”地保留了西南民族的传统。从而使得此后苗瑶侗以一种唱歌跳舞的民族形象得以呈现。

歌舞部族的形象自是用来呈现给在桂的汉族观众，但对于苗瑶侗人而言，接受政府关于他们的表述并来到省府进行民族歌舞展示，亦能获得相当的回报。在特师成立之前，1931年大瑶山紫荆山区的石牌头人<sup>5</sup>李荣保即带领十六个瑶民前往彼时省府南宁“晋省观光，谒见当局”，在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接待后，李荣保等瑶民于南宁乐群社向省府公职人员表演了瑶族歌舞。随即广西党部发动宣传，在《南宁民国日报》上将李荣保塑造成为一个愿意带领瑶民接受政府“开化”的“瑶王”形象。<sup>6</sup>

李荣保在1931年的行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sup>7</sup>事实上整个过程也通过影像的方式进行展示。受美国蛮荒野兽猎奇片的影响，1932年，由在沪粤人黄漪磋、台湾人刘呐鸥和广西人黄嘉漠投资的上海艺联影业公司决定将李荣保的故事搬上荧幕。<sup>8</sup>1930年，广西当局派遣党政训练所毕业生黄云焕等人前往瑶山任化瑶学校教师，不久，黄成为李荣保的赘婿，正是在黄的牵引下，李荣保与广西当局发生了联系。艺联公司拍摄的电影，以瑶族“驮马爷”黄云焕协助李荣保清剿匪患，为瑶族地区社会做出贡献为主线，突出表现“开发瑶民”、“沟通文蛮分野”、“发

<sup>1</sup> 施平：《谈土风歌舞》，《建设研究》1940年第6期，第60页。

<sup>2</sup> 1942年，特种师资训练所更名为桂岭师范学校。

<sup>3</sup> 文丰义主编：《寻找桂林历史文化的力量 纪念“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sup>4</sup> 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下）》，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sup>5</sup> 石牌头人是瑶民对石牌制定者、领导者和监督者的称呼。所谓石牌制，即是瑶民的习惯法，瑶民为了维护当地的生产和社会治安秩序，两村或数村之间通过石牌会议订立石牌条约，并镌刻在石碑会木板上，共同遵守。拥有石牌的小村寨，其头人叫“小石牌头人”，而大村寨或众多村寨制定的石牌，领导者则为“大石牌头人”。与汉人一县只能管理一县，一乡只能管理一乡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同，瑶民跨越多县的石牌制和由此形成的石牌头人集团，更好的适应了瑶山的地理环境，使得瑶民形成了一套良好的自我组织又保持各自联系的内部管理机制。莫金山：《瑶族石牌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4页；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等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sup>6</sup> 覃晓：《“瑶王”李荣宝事略》，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少数民族专辑》，1988年，第168页。

<sup>7</sup> 王广飞：《十七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第6页。

<sup>8</sup> 《电影快报：黄漪磋创办联艺影片公司》，《妇女生活（上海1932）》1932年第1卷第24期，第629页；许秦蓁：《摩登·上海·新感觉——刘呐鸥（1905-1940）》，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63-164

掘瑶民原始遗迹”三个主题，摄制成为电影《瑶山艳史》，整个拍摄过程在广西完成，同时由刘呐鸥、黄嘉谟在沪合办的《现代电影》杂志，发布了“瑶王”李荣保的照片和瑶民的服饰照、瑶区的风景照。<sup>1</sup>1933年9月影片在上海上映，票房大卖，“瑶王”的照片随即成为上海各报竞相刊登的广告。电影制作完成后，艺联公司的摄影团队并没有马上离开广西，而是接受广西政府的盛情相邀，继续在桂拍摄了《桂游半月》和《南疆重镇》两部短片，同时录制了一部白崇禧检阅民团的纪录片。<sup>2</sup>透过艺联公司的镜头，新桂系将自己的边疆治理政绩展现给全国，同时第一次以动态影像的方式将瑶人展示给内地的民众。一方面，正是在洞悉到新桂系准备利用当地瑶人“开化”瑶山的策略后，李荣保以主动迎合政府的姿态换取政府支持他开发瑶山西南隅十八山的计划，并成为新设的十八区的区长，而李本人作为“瑶王”的形象也通过电影传播到内地。另一方面，政府也乐见扶持李荣保成为“汉瑶合作”的典型，并借用艺联公司之手，在全国宣传桂省的民族治理以抬高新桂系的声势。但十八区既不用完粮纳税，也不用派役征兵，俨然成了李荣保的“独立王国”。

特师成立后，苗瑶僮学生接受了国语的训练，在生活、生产方式上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同时作为西南民族的代表，前往桂林进行民族歌舞展示。然而一经毕业，重返瑶山的瑶族学生，所做的移风易俗工作却并不多，更多的则是利用特师毕业生的身份，借助政府代理人的名义，成为地方上新的领袖，在汉人官方和瑶人地方之间根据情势变化把握平衡，随时做出精明抉择以攫取自身利益。瑶山罗香乡的瑶族特师学生赵乾兴和蒙建青，作为特师精心培养的两位学生，1939年毕业后回到瑶山，因战时交通不便、邮道不通，无法与特师联系，为了维持地位，他们选择与石碑头人一道参加“石碑会”，并参与讨论维护“石碑制”以抵制政府进山编乡的活动。1940年广西当局强制进入瑶山“开化”，废除了与石碑头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石碑制”并成立金秀警备区署，此举立刻激起瑶变，在政府与石碑头人发生冲突时，赵乾兴与蒙建青又转向支持政府，并在瑶变平叛后分别担任新设立的金秀设治局警察队长和教育股长。<sup>3</sup>1944年，大瑶山金秀县的一位特师毕业生，在成为当地的乡文书兼小学教师后，利用特师所赋予的身份，在当地带有“群婚”性质的“点火把”习俗中，该生拥有了6个火把情人，但“点火把”的习俗却正是特种教育委员会所深恶痛绝并坚决要求扫除的“瑶民陋习”。<sup>4</sup>由此可见，广西当局建立特师旨在希望通过特师学生来“开化”苗瑶僮侗区域，但回到当地的特师学生却有自己利益的考量，广西整合民族的进程也因牵涉到政府、石碑头人和特师学生等诸方利益而进展缓慢。

## 结 语

当一战后“民族自决”进入到东亚，“民族自决”论在成为中国反击日本侵略的武器同时，也成为自身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20世纪30年代起，暹罗政府不断抛出各类宣传，宣称泰人要收复在云南和广西境内的“失地”，英印政府也怂恿靠近缅甸的中国国境内的土司进行独立活动。为了应对强邻的挑战，也为了顺利推行民族政策，广西当局需要对境内的民族进行更为合理的表述。但具体识别西南的民族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西南的地理形势<sup>5</sup>，各族群散落交

页。

<sup>1</sup> 《文蛮的分野：艺联公司征桂摄“瑶山艳史”与瑶王合影》，《现代电影》，1933年第4期。

<sup>2</sup> 《艺联公司两新作》，《现代电影》，1933年第6期。

<sup>3</sup> 赵乾兴：《我当上国大代表的前前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续编（五）》，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sup>4</sup> 莫金山：《瑶史考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470页。

<sup>5</sup> 广西即处于詹姆斯·斯科特所定义的佐米亚（zomia）地带，这里高山河流纵横，覆盖着难以清除的密林，密林之中时时有瘴气产生。各类族群散居在高山、湖沼、密林之中，很多族群都老死不相往来。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织在一起，同族群内语言、服饰、习惯的差异甚至比族群外的差异还要大，<sup>1</sup> 对于任何民族学家而言，西南地区都很难用现代“民族”这一工具去加以认识和厘定。也因为无法分辨，给了暹罗政府“南诏泰国王族”说的同时，也给了广西学人或是表述“具备现代国民的素质但种类不一”，或是表述“同源同种但处古代社会”等各种表述的机会。身为学人也身为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的刘介，他的《苗荒小纪》、《岭表纪蛮》不仅是彼时中国关于广西苗瑶僮等族的学术著作，也是广西当局的进行民族同化的指南。

抗战军兴，国府内迁，给了广西空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广西人士笔下的苗瑶僮等族的地位也进一步获得了提高。徐松石将“僮族”表述为“纯汉”，构建了一个僮人开发整个南中国和中南半岛的历史。赋予了僮人前所未有的地位。而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师生歌舞表演成为了抗战时期南下文艺界团体了解边地民族的窗口。抗战时期，要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必须激发全国民众对于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想象，刘介带领特师学生展示民族歌舞，正给了大后方的知识界关于中国边地风光的想象。在表演苗瑶僮歌舞后，南下的知识人“发现了”广西的民族文化，并认为西南民族的歌舞艺术可与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洋音乐一较高下。由此，广西民族文化也在知识人的论述下成为了建构新的现代的国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给了广西民族文化保存的契机，也使得能歌善舞成了西南民族的单一符号<sup>2</sup>。但对苗瑶僮等族群而言，接受广西当局与知识界关于他们的民族表述，并来到省府进行歌舞展示，与其说是他们接受了政府的民族整合政策，倒不如说他们是被成为政府代理人而能获得的利益所吸引。回到瑶山侗岭，地方头人与特师学生往往灵活地与政府周旋，在“开化”与保持“蛮化”之间做出精明的取舍，而政府整合民族之路依旧困难重重。

## 【报刊文章】

###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sup>3</sup>

——读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赵鼎新

在当今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在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如课堂教育和宣传)，在本地区传统的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等观念。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如果打造得比较成功，居住在同一个国度中的民众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有着统一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民族国家。

虽然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但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洲率先兴起的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教会国家等等类型。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在欧洲兴起？

<sup>1</sup> 如苗就分为红苗、青苗、黑苗，各苗之间语言、服饰、习惯均不同，甚至互相敌对。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瑶族当中。见刘介：《岭表纪蛮》。

<sup>2</sup> 此种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广西文史馆馆员的唐兆民搜集材料，将僮人刘三姐的故事加以整理，此后“刘三姐歌谣”和电影《刘三姐》在中国家喻户晓。

<sup>3</sup> 本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5月7日第24版。

